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7.05.012

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建构特点研究

——心理文化学视角的考察

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100007)

[摘要] 战后日本在国家组织体侧面的认同建构,主要体现在积极接受和平宪法等战后改革举措,建构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在国家文明体侧面的认同建构,主要体现在追求日本独特性和日本文化优越性方面。前者,对内促进了其社会的稳定,对外为日本赢得了国际声誉;后者,对内提升了日本人对其历史文化的自信,与此同时,也煽动了其民族主义情绪。

[关键词] 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组织体;文明体;海洋国家

[中图分类号] K31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7)05-0076-07

国家认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稳定。战后日本社会呈现出很高的凝聚力,其社会秩序一直都处于比较稳定状态。研究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特点,对了解日本社会稳定发展的原因及现状,前瞻日本国家发展走势,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对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特点的研究现状及视角

经济全球化促使信息、人员等跨国流动日益频繁,民族问题在许多地区日益凸显,国家认同问题亦因此受到严重冲击。对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而言,在建构国家认同时,往往要面临的一个困境是,既不能通过民族的“同质化”来强化“国家认同”,又不可为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削弱“国家认同”。因而,综观国内外学界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丰硕成果,其研究内容大多聚焦于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所面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问题及相应对策建言等^{[1]77-81}。日本的民族构成,除了少数的阿伊努人、被强行合并的冲绳人及因历史问题造成的在

日朝鲜人,几乎是单一人种^{[2]117-118}。也许正因日本国家的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国内外学界多将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等同于其民族认同建构来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研究还十分薄弱。截至2017年1月,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篇名含有“日本”“认同”字样且内容是研究日本人的认同问题的期刊论文仅有19篇,硕士学位论文8篇,报纸文章8篇。其中,研究战后日本“国家认同”问题的期刊论文仅有3篇,硕士学位论文2篇,报纸文章1篇。篇名含有“日本”“国家意识”或“民族意识”字样的论文合计近50篇,大多是研究日本近代国家、民族意识的文章,论述战后相关领域的论文仅有3篇。专著中特设章节论述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文章仅见1篇。

即有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研究,主要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对战后日本国家意识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解析,对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象征天皇制进行了探讨,对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依托的内外资源进行了梳理。国家认同主要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知悉和接受,是对本国的

[收稿日期] 2017-05-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SS01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GJ08_2017_SCX_2977)。

[作者简介] 张建立(1970—),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及国家主权等方面的认可。在国内外学界,国家认同建构问题已成为多学科研究的主题。国家认同建构,实质上也是对国家的心理归属感的建构。本文引进心理文化学视角的考察,旨在拓展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研究视野。

心理文化学,是进行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学问。作为一个学科,它可追溯到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国民性研究。国民性研究是一门回答“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学问。由于“文化与人格”学派在“人格”概念使用上的缺陷,后被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以心理人类学所取代。北京大学尚会鹏教授历时22年对许氏学说进行梳理,并提出了若干新的概念予以完善,将其中对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这一部分,从心理人类学中分离出来,作为行为科学系统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于2010年正式命名为“心理文化学”。尚会鹏教授的弟子游国龙,也为该理论方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3]。“心理文化学”作为升级版的国民性研究方法,不仅能为当今世界寻求身份认同提供帮助,亦是解析各类身份认同建构特点等问题的有效工具。

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国家作为行为体,既是“文明体”同时又是“组织体”。文明体可视为一种知识、规范、观念的共同体,它强调的是组成该国家的人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等。组织体是由社会集团、国家形式、政治制度等组成的功能体,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制度等。文明体与组织体相互影响。由于文明体本来隐于组织体中,现代国际秩序产生时的国家行为体,处于同一西方文明背景之下,作为组织体的国家——民族国家和作为文明体的国家重合在一起,致使国家的文明体侧面长期以来被作为“民族体”看待了。但是,显然“民族体”不能取代“文明体”^{[4]3-19}。国家行为体亦不能简化为单纯的组织体。引进心理文化学的这一视角,有助于更全面系统地解析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特点。

二、战后日本在国家组织体侧面的认同建构特点

作为国家行为体两个侧面的“组织体”与“文明体”,从性质上看,前者变化快,后者变化慢。关于国家“组织体”侧面的易变性,战后日本在国家组织体侧面的认同建构,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在日本投降之前,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将日本民众称为“顺从的畜群”^{[5]191}。“拥抱战败”,则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对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特点的一个形象评价。战后日本在国家组织体侧面的认同建构,首先体现在对战后改革举措的积极接受和认同。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除了大规模清洗军国主义分子外,还在日本强制推行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史称其为战后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战后改革,莫过于日本人对和平宪法的欣然接受。1946年11月3日颁布,自1947年5月3日起实施的《日本国宪法》,可谓战后民主化改革的总结。它规定了日本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成为战后日本国家组织体侧面认同建构的总目标。

对于推动日本战后改革的动力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是来自于美国占领当局,一种则认为是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即日本国内民众是改革的内在基本动力,美国占领当局是外在附加动力^{[6]154}。这两种观点体现在对待和平宪法的态度上,前者倾向于认为和平宪法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后者则倾向于认为是日本主动选择的结果。如我国学者曾指出,日本民间对宪法起草发挥了作用。“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取消天皇统治权力、生存权、义务教育的延长等基本原則最早出现在宪法研究会《宪法草案纲要》等日本民间的草案中。根据美国方面公开的资料,可以认定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即GHQ(盟军最高司令部)提供给日方的草案实际上是在这些民间草案基础上生成的,在日本国会的宪法审议委员会的讨论中,重要的条款也是在宪法研究会成员的建议下采纳的。因此,关于战后宪法,至少应当承认日本的知识分子是最早的提案者,也是主要起草者,宪法研究会的成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美国的GHQ则是宪法颁布过程的具体推动者。”^{[7]72-73}也有日本学者称“日本在二战战败后,被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占领之下的日本国民,遵照《波茨坦宣言》的精神,作为日本在战败后获得再生的基本法,接受了《宪法》。当时,日本国民具备了支持和遵守宪法的决心与希望的内在心理条件。换言之,‘内在’于日本国民心中的深厚的‘和平文化’的思想根基,在日本的近代化之前就已产生。在经历了全民战争所带

来的被害与加害的惨祸之后,这一和平思想最终在宪法的制定中得以结晶。”^{[8]28-30}

当然,无论哪一种观点,实质上都没有否认战后日本在国家组织体侧面认同建构过程中所体现的“顺从的畜群拥抱战败”这种盲从性特点。如有学者指出:“从宪法修改过程看到,日本政治体制的解体与重构是在瞬间完成的。日本全民参与讨论的缺位和天皇制的保留以及旧官僚体制的复活,导致日本社会没有得到完成彻底意识变革的机会。本来,国家宪法的重大修改意味着社会的重大变革,需要社会民众彻底的意识变革的伴随。但是,日本是在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情况下否定了明治宪法。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强力推动,不能不使得日本的‘市民革命’带有外观性,缺少内在的自省。”^{[7]76}道尔在其著作对日本人的顺从表现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记述。例如,日本北海道一群原住民阿伊努人捕杀了一头鹿,特意把鹿皮和鹿茸敬献给了麦克阿瑟,称以此“作为对他为我们国民保卫疆土,并给日本带来建立在法律与秩序基础上的民主社会的感激之情的象征”。还有一位因新宪法颁布而欣喜不已的日本人,使用蝇头小字将整部《宪法》写在扇面上寄给了麦克阿瑟^{[5]206}。另外,当时各行各业的很多日本人还自发给麦克阿瑟写信表达感激之情。据官方记录,从1946年9月到1951年5月,同盟国翻译通译局(ATIS)阅读并处理了44万多封信函和明信片^{[5]204}。其中,有人竟然给麦克阿瑟写信称:“迫切要求日本被吞并,或成为美国的永久殖民地,否则民主改革将很快破灭”^{[5]207}。

其实,日本民众对美国占领当局表现出的这种顺从,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谓是响应了日本政府的号召。自1945年东久迩内阁至1956年间,日本历届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最多的就是号召日本国民要以美欧等西方国家为榜样建设日本,以期早日成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一员^{[9]29}。时至今日,日本首相依然在重复着类似战后初期日本民众的顺从行为。例如,2016年安倍访问美国珍珠港慰灵发表讲话时依然很煽情地说:“战争结束了,日本化作一望无尽的焦土废墟。就在日本贫困交加、痛苦挣扎之时,不惜一切送来食物、衣服的正是美国、美国国民。多亏美国国民送来的毛衣、牛奶,我们日本人的生命才得以延续。此外,美国还为日本在战后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开辟了道路。在美国的领导下,我们

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得以享受和平与繁荣。”^[10]

当然,被英美学者讥讽为“拥抱战败的顺从的畜群”的日本民众和政治家们,虽表面上对美国极度顺从,但内心是否也那样想就未必了。事实上,日本这种举国一致唯美是从的表现,自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发生明显改变。1955年11月15日成立的日本自民党,在阐述其“建党使命”时,就明确将当时日本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归咎为美国占领当局,称“导致日本社会诸多问题的一半原因就在于战败初期的占领政策的错误”,“要大力完善以现行宪法的自主修改为首的独立体制,以不辜负国民的委托。”而且,在建党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中明确表示,要“开始进行现行宪法的自主修改。另外,要依据国情重新探讨修订和废除各类占领法制”^[11]。日本自民党建党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自民党宪法调查会”,由岸信介任会长。在1956年第24届国会上,时任首相的鸠山一郎首次宣称,日本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一员了。同时,他再度强调:“我国欲实现真正独立自主,就要按照我国国情对被占领时期制定的各种法令制度进行修改。我在上次国会提出了修改宪法和改革行政机构的施政目标。我坚信,在终战十年的今天,这两个目标才是作为衷心期盼日本独立的为政者最当优先考虑之事。特别是对于规定国之大本的宪法,其内容与制定时的经纬和形式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我一直在思考,为推动日本国民用自己的手来制定自己的宪法,首先内阁应该通过设立宪法调查会的手续,来开始慎重地探讨此事。”^{[12]21}安倍晋三也曾在其著作中表达了与此相同的观点,称:“《旧金山和约》只是让日本恢复了形式上的主权。战后日本的体制,如宪法以及规定教育根本方针的《教育基本法》,都是被占领时期制定的。国家的框架必须由日本国民自己亲手从空白做起。如此方能恢复真正独立。实现修宪才是恢复独立的象征,亦是恢复独立的具体手段和途径。”^{[13]32-33}安倍晋三自首次执政以来,就明确提出要“摆脱战后体制”和“修宪”。如今,虽然安倍的修宪目标经历了由“修改宪法第9条”到“修改宪法第96条”,再到不拘内容只要修了宪即可的“结果论”的调整,一再降低,但从当前日本政治生态来看,继2014年12月大选自民、公明两执政党控制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绝对多数议席后,经2016年7月参议院定期选举,以执政党为核心的“修宪势力”又控制了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绝对

多数议席,当下也许是 1947 年以来最有利于日本实现修宪、重建日本国家组织体认同的时候。

总体看,战后日本在国家形式、政治制度等国家组织体侧面的认同建构,经历了 1955 年代之前对美国如“顺从的畜群”般的依赖期后,开始进入对组织体侧面认同建构的反省和抗争期。这一特点,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制度等国家组织体侧面的认同建构过程中也有几乎同样的体现^{[14]204-456}。关于战后日本建构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对日本社会稳定所发挥的作用,已有较全面的研究^{[15]122-153},不复赘言。

三、战后日本在国家文明体侧面的认同建构特点

战后日本在国家文明体侧面的认同建构,主要体现在追求日本独特性和日本文化优越性方面。随着日本国力兴衰,一些所谓的日本独特性,时而变成日本民族劣等论的立论依据,时而又会被视为宣讲日本民族优秀论的素材^{[16]132-134},对世界的日本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中国学界的日本研究为例,自 1980 年以来,中国学界也曾醉心于日本国家文明体的研究。据对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日本国民性研究论文的不完全统计,以题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日本模式”字样为首,研究日本独特性或日本国民性优秀程度的论文,占了日本国民性研究论文的绝大部分。而且,大多是对“日本人”或作为日本人“身份”的对象而存在的“日本文化”特殊性,进行礼赞或肯定性评价的文章^{[17]134-135}。本来,研究日本国民性,若能通过解析真正的“日本式”“日本型”现象,深入了解日本人及其国家社会,不仅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也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式’这一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既然可以称之为日本式,那么就必须是其他任何社会都不具备的属性,至少这种属性需要在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否则就不能冠之以‘日本式’的名号。但事实上,时下流行的日本人论,虽然对日本情况如数家珍,但对于作为比较对象的其他社会,不管是信息还是认识,都了解甚少。”^{[18]80-81}。

也有学者指出:“日本的某些特质使人们乐于封闭地看待它,而战后的密闭空间,也极易使人将其夸张地视为‘典型的’独特的日本经验。不仅是外来者倾向于孤立和隔离日本的经验,其

实没有人比日本国内的文化本质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对国民性与民族经验假定的独特性更为盲目崇拜了。甚至是在刚刚过去的 1980 年代,当日本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宰出现时,也是其‘日本’经验的独特性,在日本国内外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尽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会通过强调差异区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区分,但是当论及日本的时候,这种倾向被发挥到了极致。”^{[5]10}

作为国家组织体侧面的内容,诚如上述学者们指出的那样,所谓“日本式”“日本型”的制度,往往既可能是“西式”的,也可能是“全球式”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作为国家文明体侧面的内容,亦确实存在着如天皇制这类“日本式”“日本型”的现象。日本放送协会(NHK)从 1973 年开始每隔 5 年就会关于“日本人的意识”进行一次舆论调查。其中,每次都会调查日本国民对天皇的认同情况。其中,对天皇抱有好评的百分比,从 1973 年至 2013 年的 40 年中,1973 年最低为 20%,1993 年达最高点为 43%,此后经过 1998 年的 35%,2003 年的 41%、2008 年的 34%,稳定在 2013 年的 35%。这侧面反映了天皇在战后日本建构国家文明体认同时所发挥的作用^{[19]9}。

战后日本在建构国家文明体侧面认同时,除了注重发挥作为文明体核心要素的天皇的作用外,在挖掘日本独特文化资源方面亦做了很多努力^[20]。在此仅简述其海洋国家认同建构情况。

四面环海的地缘特征,虽非日本独有,但的确有利于日本人建构海洋国家认同。“日本‘记纪神话’中关于海洋神话的记载,成为后人探讨海洋国家起源的主要根据。”^{[21]44}但事实上,虽称日本为岛国没有争议,但是否可以称之为海洋国家,至今在日本亦依然存在争议。岛国,一般会给人一种内向、狭隘闭塞之感;海洋国家,则多给人一种外向、开放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日本的精英们在内,更倾向于把日本视为岛国,而非海洋国家。例如,时任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在 2009 年第 173 次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讲时说到,现在鸠山内阁要推动的平成维新,就是想尝试把日本从岛国变成开放的海洋国家^{[22]6}。另外,谈到日本国民性时,人们常常会提到日本的“岛国根性”,指的就是日本人长期居住在狭小而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狭隘保守、自卑小气但又妄自尊大、盲目自信的国民性格。“岛国根性”概念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末,是当时日本留美学者久米邦武提出来的^{[23]4}。

从日本众参两院国会会议记录中关键词“海洋国家”出现频率的检索结果来看,1945年1月至1967年12月间出现2次,1968年1月至1979年12月间出现128次,1980年1月至1999年12月间出现218次,2000年1月至2017年1月间出现366次。作为日本国家意志,日本政府明确表达要建设海洋国家的意愿,始见于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三木武夫在1968年召开的第58次国会上做的关于外交的演讲。三木武夫讲到:“一般而言,一国的外交政策,要受该国家所处的环境这一基础条件限制。那么,我国的基础条件究竟是什么?日本是被海包围的岛国。国土狭窄资源匮乏,邻接巨大的亚洲大陆。这就是日本所处的环境。这样一个环境,作为基础条件,给予了决心和平生存下去的日本如下三个方向。即,日本作为海洋国家不采取孤立主义,必须考虑作为世界中的日本、亚洲太平洋中的日本生存下去的道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只要日本置身的环境没变,作为日本生存下去的方向及指针的日本外交基本路线就不会变。(会场鼓掌)即使是在光辉灿烂的明治百年历史中,也曾因违背了这一基本路线,想要做大陆国家而招致过失败。这是历史的宝贵教训。”^{[24]13-14} 与三木的讲话相比,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讲话则更简明易懂。他曾在《日本经济新闻》“我的履历书”专栏中以援引德富苏峰谈话的形式讲到:“回顾日本的历史,染指大陆时需格外慎重。神宫皇后、丰臣秀吉、大东亚战争,皆为失败的历史。海洋国家染指大陆必须慎重,否则将来会遭大殃的。”^{[25]17} 国家认同的建构,是一个既“求同”又“斥异”的过程。从日本政要及智库精英的发言来看,战后日本的海洋国家认同建构之初,更侧重于向内“求同”,是在重新反省日本的地理环境特征基础上,作为吸取对外发动战争失败的教训,而倡导建构海洋国家认同的。而且,直至20世纪末,这一目的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从日本国会会议记录中关键词“海洋国家”出现频率明显增加的检索结果亦可知,日本关于海洋国家认同建构的探讨不仅增加了,而且,从相关智库的研究报告以及一些日本政要的发言来看,日本关于海洋国家认同建构的目的也开始发生明显转向,即由当初基于对日本地缘特征的认识而向内“求同”,转向了以中国为“斥异”对象的所谓开放型海洋国家认同建构^[26]。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的“海洋国家研究

小组”活动可视为一个标志。该研究小组成立于1998年,历时四年,分设如下主题,就日本海洋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1998年度的主题是“日本的认同:既非西洋亦非东洋的日本”;1999年度的主题是“日本的战略:从岛国到海洋国家”;2000年度的主题是“日本的战略: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2001年度的主题是“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该海洋国家研究小组成员不仅是日本学术界的中坚力量,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是当时小渊内阁“21世纪构想”政策集团的重要成员。随着海洋国家研究小组的研究报告及其成员的大量相关论著的发表,扩张性的海洋日本论或海洋国家论对日本社会逐渐开始产生影响^{[27]46}。

2007年7月20日,日本《海洋基本法》正式实施。其中第七条规定,日本要以为海洋国际秩序的形成及发展发挥先导性作用为宗旨,来推进日本海洋政策的实施与海洋方面的国际合作。2007年7月31日,安倍首相参加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第一次会议致辞时说:“必须把海洋基本法颁布并实施的今年,作为迈向真正的海洋国家的元年。”^[28] 如前文所述,2009年时任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在第173次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讲时称,其内阁要推动的平成维新,就是想尝试把日本从岛国改变为开放的海洋国家。安倍、鸠山的发言说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日本自民党、民主党等主要政党都尚未把日本视为一个真正的开放型海洋国家。但待到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2013年在第183次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讲时已明确声称:“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美国与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成为搭档伙伴是理所当然,有必要不断加强彼此的关系。”^{[29]4} 安倍政权下的日本海洋国家认知已经昭然若揭,而且毫不掩饰其与中国的对抗之心。有学者甚至指出,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110多年中,与海洋国家结盟一直是日本外交遵循的轨道和推进的重点,而且,中国一直是日本“海洋国家结盟”战略防范的主要目标。“不论是上个世纪初的日英同盟,还是战后建立起来的日美同盟,抑或是当今日本欲构筑的价值观联盟、铁三角同盟等海洋国家联盟体系,中国均是日本针对的目标:或者是日本蚕食、掠夺的对象,或者是日本牵制、抗衡、围堵、遏制的对象。”^{[30]113-114}

四、对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建构的总体评价

战后日本从1945年至1968年仅用23年时

间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截至让位于中国的2010年,一直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长达42年。如今作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其经济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学界多认为日本是一个从废墟中崛起的国家,视战后日本的发展是东洋的奇迹。也有学者指出,这种概括不符合历史实际。“战后的日本是一个稍受损失的已步入重化工业阶段的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有相当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潜力的国家,决不是一片废墟,更不是一切从零开始。‘一片废墟’论可以休矣!”^{[31]132-135}无论如何,国际社会对战后日本国家的发展大多还是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日本战后国家认同建构的角度来看,这种赞誉应该说首先是来自于对战后日本国家组织体侧面认同建构的认可。战后日本接受放弃战争的《日本国宪法》,接受新宪法所设定的战后日本国家组织体侧面认同建构总目标,建构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打造了稳定的日本社会,为日本国民营造了和平富足的生活。自2014年至今,日本民众为了阻止安倍政权修改宪法第九条,特向诺贝尔委员会申请给日本宪法第九条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这一申请已连续三年被列入诺贝尔和平奖候选名单。这本身也是对战后日本国家发展历程的一个高度认可和评价。

其次,战后日本通过追求日本的独特性和日本文化的优越性来进行国家文明体侧面的认同建构,与组织体侧面的国家认同建构相得益彰。从一些较权威的舆论调查数据来看,不仅对内大大地提升了日本人对其历史文化的自信,而且对外亦打造了良好的日本国家形象。

作为国政参考的基础资料,日本内阁府从1969年开始对一般国民的国家和社会意识开展调查。其后,几乎每年都会进行1次这样的调查。每次调查的主题设定、问卷设定都会略有调整,但有些问答选项是恒定的。从1971年10月“关于日本人的社会意识舆论调查”起,调查问卷中加入了“关于日本的国家或国民,你认为可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这一问答选项,并沿用至今。通过这个长达近50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可以对战后日本在国家组织体与文明体侧面认同建构情况有一个定量的把握^[32]。

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为打造良好的日本国际形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对25个国家的影响力调查结果显示,获得正面评价,排名第4

的是日本^[33]。2016年1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全球最佳国家排名,日本名列第7,是整体评比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唯一的亚洲国家。这项评比是以全球60个国家的1.6万人为对象进行的意见调查。评分标准包括冒险性、公民权、文化影响力、企业精神、遗产、未来GDP及人均购买力走势、对企业的开放性、权力和生活品质等几大类,每一个单项标准满分为10分。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单项得分是7.1分,企业家精神单项得分高达9.9分^{[20]133-134}。

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建构举措不仅产生了如上积极效果,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战后日本虽然接受了新宪法所设定的战后日本国家组织体侧面认同建构总目标,但否定组织体侧面的国家认同建构成果,以谋求日本“正常国家”化为目标,主张要自主修宪谋求日本军力国际化的声音一直未停,而当下的日本政治生态使这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有可能。此外,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是建构国家文明体侧面认同的重要手段,一个民族的崛起常常以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先导。战后日本在国家文明体侧面认同建构过程中,以建设“美丽日本”“强日本”为目标,挖掘民族历史中曾经有过的辉煌和传统文化价值中的日本特性,幻想再次垂范世界。这虽重建了日本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但也煽动了其民族主义情绪,乃至出现了日本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与右派政治家开始趋同的态势。尤其近些年以对抗中国为目的的海洋国家认同建构,更是蕴含着诸多在亚洲地区制造事端的风险。有学者曾指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它具有应急性的特点(即一切都围绕摆脱殖民地危机而展开)。”^{[34]71}其结果,使日本走上了一条侵略扩张的道路。尤其在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在“伪满国家建设与殖民话语体系的构想”上越走越远^{[35]70}。战后日本,无论组织体层面还是文明体层面的国家认同建构,其实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围绕尽快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而展开的。特别是以对抗中国为目的的开放型海洋国家认同建构,应急性特点颇为明显。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对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中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亦当予以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 [1] 陈茂荣. 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综述[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 [2][日]遠山茂樹.日本の民族形成の特質[A].岩波講座日本歴史24[C].東京:岩波書店1982.
- [3]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4]尚会鹏.人、文明体与国家间关系[J].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13(4).
- [5][美]约翰·W·道尔,胡博.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6]王振锁.评田桓著《日本战后体制改革》[J].日本学刊,1991(2).
- [7]李薇.成功与遗憾——日本战后宪法的制定[J].读书,2009(4).
- [8][日]深瀬忠一,[日]铃木敬夫.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J].太平洋学报,2008(11).
- [9]张建立.战后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及成因[J].日本学刊,2015(5).
- [10]安倍晋三.安倍内阁总理大臣访问美国 日美两国首脑发表的讲话(在珍珠港的讲话)[EB/OL].http://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612/1220684_11167.html.2016-12-12.
- [11]日本自民党.党的使命.[EB/OL].<https://www.jimin.jp/aboutus/declaration/>.2016-12-12.
- [12]衆議院.第24回国会会議録第4号 鳩山国務大臣の演説[J].官報(号外),1956.
- [13]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 完全版[M].東京:文芸春秋,2013.
- [14]杨栋梁.日本近现代经济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 [15]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国为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16]张建立.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J].日本学刊,2006(6).
- [17]张建立.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现状与课题[J].日本学刊,2011(1).
- [18]罗斯·摩尔,杉本良夫.日本人论之方程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9]高橋幸市,荒牧央.日本人の意識・40年の軌跡(2)[J].放送研究と調査,2014(8).
- [20]张建立.试析日本文化软实力资源建设的特点与成效[J].日本学刊,2016(2).
- [21]陈秀武.幕末日本的海洋国家论[J].日本学论坛,2007(4).
- [22]衆議院.第173回国会会議録第1号(一) 鳩山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ついての演説[J].官報(号外),2009.
- [23]参議院.第107回国会 国民生活に関する調査会会議録第2号[Z].1986.
- [24]衆議院.第58回国会会議録第2号(二)三木外務大臣の外交に関する演説[J].官報(号外),1968.
- [25]福留民夫.明治・大正・昭和の教訓と新世紀日本の進路[J].経営論集.2002(12)
- [26]星山隆.海洋国家日本の安全保障——21世紀の日本の国家像を求めて[R].財団法人世界平和研究所,2006.
- [27]周伟嘉.海洋日本论的政治化思潮及其评析[J].日本学刊,2001(2).
- [28]安倍晋三.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第一次会议致辞[EB/OL].<http://www.kantei.go.jp/jp/abepphoto/2007/07/31kaiyou.html>.
- [29]衆議院.第183回国会会議録第八号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施政方針に関する演説[J].官報(号外),2013.
- [30]屈彩云.论日本与海洋国家结盟的历史演变[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6).
- [31]高新民.投降后的日本是“一片废墟”吗[J].学习与探索,1998(1).
- [32]日本内閣府大臣官房広報室.社会意識に関する世論調査[EB/OL].<http://survey.gov-online.go.jp/index-sha.html>.2016-12-12.
- [33]BBC 民调:中国国家形象排名第9[N].参考消息,2013-05-24(3).
- [34]陈秀武.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 [35]陈秀武.“伪满”建国思想与日本殖民地奴化构想[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war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sychoculturalogy

ZHANG Jian-li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war Japan, in the aspect of organizational entity,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accepting the postwar reform measures and constructs the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basic of economic benefits. while in the aspect of civilizational entity,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pursuit of the uniqueness of Japan and the superiority of Japanese culture. The former one promotes social stability to the internal while win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to the external. The latter one promotes the Japanese self-confidence for their historical culture and inciting nationalist sentiment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Postwar Japan; National Identity; Organizational Entity; Civilizational Entity; Maritime State

[责任编辑:赵红]